

理學、士紳和宗族

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

章毅 著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士紳和宗族
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

章毅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理學、士紳和宗族：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

章毅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505-1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Neo-Confucianism, Gentry and Lineage: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Huizhou from Song to Ming Times (in Chinese)

By Zhang Y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05-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地圖目錄	vii
表格目錄	ix
第一章 序論	1
第二章 早期徽州的地域和歷史	11
第一節 黟歙之地	11
第二節 程靈洗、汪華本事	15
第三節 豪強與道師的世界	21
小 結	28
第三章 宋代徽州的科舉、佛教與理學	35
第一節 科舉士人的出現	35
第二節 士大夫與佛教	38
第三節 南宋股肱之地	42
第四節 理學的興起	49
小 結	55
第四章 理學的傳播與元代徽州社會	63
第一節 社會流動的新趨向	63
第二節 新安師儒與理學的傳播	69
第三節 理學鬼神觀及其影響	79
第四節 元代後期的理學社會化	85

小 結	94
第五章 元明之際徽州地方信仰的宗族轉向	103
第一節 宗族觀念的興起	103
第二節 知本堂、汪王廟與端公祠	106
第三節 婺源大畈汪氏	115
小 結	124
第六章 明初禮制與歙西的豪族	131
第一節 地方儒士的政治選擇	132
第二節 洪武禮制及其地方實踐	143
第三節 歙西豪族的衰落與重興	148
小 結	161
第七章 明代中期的新安程氏統宗	171
第一節 程靈洗崇拜與世忠行祠	171
第二節 率口程氏的商業與宗族	178
第三節 程敏政與新安程氏統宗	189
小 結	203
第八章 結論	213
附表一 宋代歙(徽)州的佛寺與道觀	219
附表二 明代率口程氏的宗族活動	231
參考文獻	235
後 記	253
關鍵詞索引	255

地圖目錄

圖1：漢代丹陽郡中之黟歙	12
圖2：三國吳時代新都郡	14
圖3：隋代新安郡	19
圖4：唐代貞元、元和時期歙州	23
圖5：南宋徽州及其六縣	43
圖6：元末徽州路及婺源大畈汪氏居地	108
圖7：明代南直隸之徽州府	131
圖8：明代歙縣鄉都及二十二都之棠樾與槐塘	151
圖9：明代休寧率口程氏居地及營商地	179
圖10：明代中期休寧縣程氏居地分佈	201

表格目錄

表1：北宋歙州聶冠卿家族中的進士	27
表2：北宋歙州的進士家族	37
表3：北宋至明代中期歙（徽）州的戶數	44
表4：元代徽州路仕宦人物的身份背景	64
表5：《新安學繫錄》中陳櫟的學術系譜	76
表6：《宋元學案》中陳櫟的學術系譜	76
表7：元明時代建陽、婺源文公廟奉祀者世系	88
表8：宋元時代婺源大畈汪氏世系	116
表9：汪叟、汪同世系	120
表10：元明時代歙縣棠樾鮑氏世系	153
表11：槐塘程氏下府新宅派世系	159
表12：宋元時代率口程氏世系	180
表13：程玩家族世系	182
表14：程文傑家族世系	185
表15：程祖瑗家族世系	186
表16：明代休寧蘇氏世系	197

第一章 序論

近年來有關宋明理學的歷史研究顯示，理學作為一種偏向於個體內省思辨和道德自覺的文化思想體系，其中卻依然包含著強烈干預外部世界的意願和動力。¹這種入世的精神，往往表現為理學修習者對自身團體生活的強調，²或理學士大夫對國家政治的關切，³尤其體現為理學儒者對地方公共事業的參與和推動。⁴而一旦深入到宋明理學觀念的社會實踐領域，研究者們也發現，以單一時段、單個思想家為中心的既有研究往往不易盡其全功，研究者須具備長時段的問題意識、群體性的研究視野，⁵以及對地方社會的充分關注。⁶

理學在地方社會的傳播和實踐並不會自動發生，其中關鍵的載體是儒學士人。在思想史家看來，宋代以後伴隨著科舉制度而大量出現的「士」群體，是儒學知識和理學觀念的主要傳習者，他們具有一種「文化超越」的特性。他們雖然屬於特定的社會階層，有著相應的社會屬性，但時常能夠超越於自身的特殊立場，成為更廣泛的利益的代言人。⁷同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憑藉著科舉所提供的社會流動渠道，成為上層文化與庶民文化溝通的重要橋樑，並由此塑造了一種「生活倫理的同一性」。⁸社會史家則更傾向於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定義「士」，認為他們在「鄉居」狀態下即為「紳士」、「鄉紳」或者「士紳」，⁹進而認為這一群體居於皇權和庶民之間，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¹⁰他們與土地租佃制度緊密相關，¹¹他們的產生依賴於科舉體系，有無功名是區分他們與庶民的最關鍵標準。¹²不同視角的史家雖然對「士紳」角色的價值判斷頗有距離，但所指對象的範圍卻基本相同，對其在地方社會中具有重要作用這一點也認識相近。

士紳群體在地方社會參與的公共事務眾多，宗族建設即為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一項。中國歷史中宗族組織的普遍存在早已為史家所關注，早期的歷史學者往往將宗族制度看成是中國文化的固有傳統之一。¹³但更多的史家則認為，只有宋代以後的宗族組織才包含祠堂、族產、譜牒等要素，並能將眾多庶民收納其中。¹⁴而這種社會組織的流行與宋明理學的傳播和理學士紳的活動均關係密切，¹⁵其中朱子《家禮》的編定和流傳是關鍵因素之一。¹⁶

人類學的研究則從另一側面指出，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族組織，實際上並非自然形成的血緣群體，而是一種「氏族化的家庭」或者「同姓的世系集團」，具有明顯的功能性和建構性。¹⁷近年來的華南歷史研究，通過展現宗族社會在南方各地的形成過程和不同模式，更清晰地印證了這種以理學「正統化」為背景的宗族建構的特徵。¹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域史和社會史的結合，不僅展現了微觀的宗族發展歷程，而且發現了宗族這一制度所具有的彈性。研究者們認為，明清時期「宗族的實踐」可以成為商人控產的重要方式，¹⁹邊緣族群尋求合法身份的表達工具，²⁰軍戶家庭應對國家軍役的靈活策略，²¹並且也是理學士紳在地方上建立與「國家正統」相關的社會秩序的過程，²²而居於這種彈性背後的，則是以往被普遍忽視的地方社會本身的自主性。地方社會在這一議題中的重要性由此顯現。

要想深入考察宋明時期的地方社會，以及其中文化因素與社會變遷的交互影響，方志、家譜和文集三種史料必不可少，而同時具備這些文獻條件的地區卻頗不易尋得。相較而言，徽州地區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現存方志中成書於宋元時期者非常稀少，僅約41種，涉及26個府州縣，當中大多數均位於長江下游。統合言之，浙江10處（杭州、嚴州、嘉興、海鹽、湖州、寧波、定海、紹興、嵊縣、台州），江蘇8處（南京、鎮江、松江、蘇州、昆山、常熟、無錫、常州），福建2處（福州、仙遊），安徽、湖北、陝西、河南、山東、廣東各1處（徽州、武昌、西安、洛陽、青州、廣州）。²³南宋徽州籍士人羅願淳熙二年（1175）所編纂的《新安志》正為其中的名作之一。

方志以外，現存的「舊家譜」約一萬餘種。根據對著錄舊家譜最為豐贍的四種目錄的統計，可知刊刻於明代及之前時期者約為700餘種，其中近300種出自徽州府，而在成書於明代中期（十五世紀）之前的約50餘種家譜中，徽州譜所佔比例更高達七成。²⁴

在宋明時期，徽州本籍的士紳文人還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各類文集。著錄於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中的徽州士人文集已超過了300種，留存至今者仍有63種，其中宋代13種、元代9種、明代41種。²⁵另外，明代徽州知名鄉宦程敏政還曾於弘治十年（1497）集群力編纂過一部大型的文章總集——《新安文獻志》。該書收錄了到明代十五世紀末為止，大約345名徽州本籍各類人士的詩文約2000餘篇。²⁶而在該書編纂之前三十年，徽州地方士人甚至已經開始嘗試這類編纂工作，明代天順四年（1460）金德珰和蘇景元編訂的《新安文粹》即是代表。²⁷換而言之，從宋代到明代中期，通過這類文章總集，徽州當地即便是未曾結集的單章零什，也已得到了相當有效的彙集。就整體的研究條件來說，研究者如欲探討宋明時期的徽州，其資料環境相當優越。

徽州位於今安徽省南部，行政地理範圍大致處於今黃山市境內。²⁸明清兩代的徽州以活躍的商幫著稱於世，自1950年代以來，更因明清契約文書的不斷發現，引起社會經濟史學界的極大興趣，近五十年來已經形成蔚為大觀的「徽州學」。²⁹不過，因為從一開始徽州學即以契約文書為中心，以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明清時期為主要時段，相比較而言，宋明之間的徽州歷史則較少引起注意，雖然也有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究，³⁰但在綜合利用傳世文獻方面，仍有非常廣闊的研究空間。

近半個世紀的徽州學研究，在土地制度、階級關係、佃僕制、商業和商人各個方面都有深入的發展，「宗族」也是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相關的研究成果雖然多關注於十六世紀以後的情形，但對於探討明代中期之前徽州的文化與社會而言，無疑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早期研究徽州宗族的學者大體認為，該社會組織的流行與徽州商人的商業活動密切相關。宗族可以為商人積聚資本，³¹建立營業網絡，³²而商人成功之後也反過來積極投身於宗族建設之中，並為此耗散了巨量

的財富，³³實現了一個「封閉」的經濟循環。³⁴而這種「商業資本愈發達的地區，鄉族勢力也愈為濃厚」的狀況，正是傳統中國無法出現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之一。³⁵在另一個層面上，徽州宗族的出現，也被學者們認為是在生存壓力之下人們展開「資源競爭」的需要。在拓殖過程中，人們要承擔土地開闢、植茶伐木等繁重的工作，宗族組織正是很好的合作工具。³⁶而一旦出現有競爭效率的宗族組織的「樣本」，別的人群就會起而效仿，從而引起宗族不斷地「擴大」。³⁷

上述議題有兩個自然的延伸。其一是產生了關於宗族的「社會控制」功能和宗族內部主導力量的討論。有學者認為，明代中期徽州宗族的出現，是原有的里甲系統逐步鬆懈，鄉村社會控制勢力多極化的表現，宗族正是其中影響力日增的一極。³⁸而在宗族組織內部起著關鍵作用的「核心人群」，則為「士紳」或者「士紳化」的商人。對於士紳來說，他們參與宗族建設的主要目的可能並不在於獲取「實際的利益回報」，而是力圖通過「敬宗收族」原則的運用，更充分地發揮社區「領導者」的影響。³⁹對於商人來說，投身宗族建設，則不僅可以有效緩解因「逐利」行為而產生的道德緊張，更可以使自身走上「士紳化」的道路。研究者進而認為，徽州的「宗族共同體」雖然「以商人為基礎」，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士紳主導」的力量。⁴⁰

另一個研究趨勢是將「競爭」延伸到了「文化」或者「意識形態」的領域。研究者們注意到，明代徽州廣泛存在的「宗祠」，有些是由帶有地域神崇拜色彩的「社廟」、「社屋」，⁴¹或者佛寺、道觀演變而來。⁴²這種廟貌形態的轉變，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後的徽州，佛寺力量不斷下降，宗族力量不斷上升的明顯變化。⁴³更進一步說，體現出明代中期以後理學在徽州日漸居於「正統」地位的狀態，⁴⁴以及在此背景下各種「禮俗」的顯著改觀。⁴⁵

概而言之，在數量豐富的徽州宗族研究中，⁴⁶大致可以分辨出三條論述線索。其一是對宗族功能的探究。研究者強調徽州宗族是運營商業的手段，展開資源競爭和社會控制的工具。其二是對宗族內部的結構分析。研究者由此關注徽州宗族內部的主導力量，尤其是士紳和商人的角

色和作用。其三是對宗族形成過程的描述。研究者轉而注重討論存在於徽州宗族背後的意識形態，及其在地方社會逐步佔據優勢的過程。三種類型的研究，雖然完全源於研究者的個人選擇，且在實踐中不乏交互呈現的多重面相，但仍能看出在發展時序上存在著前後遞進的關聯。其中宗族形成過程的議題，更因應了近年來學術界「宗族建構」的新認識，而吸引了研究者更多的注意力。

本書的研究即選擇徽州為代表性個案，在由宋至明的長時段內，深入探究理學在其中傳播的複雜過程，士紳群體形成並逐步理學化的曲折經歷，以及商人參與的宗族實踐與上述因素的交互關聯。其中那些較少為人關注的方面，將成為本書的研究重點。比如：士紳群體在徽州是否早在南宋時期就已伴隨科舉的普及而大量產生？理學在徽州發生全面影響是否可能是元代才出現的現象？最早的宗族建設，是否有可能在元末明初就已經由理學化的士紳開始實施？而宗族組織的流行，是否在十五世紀就已經在士紳和商人的合作中開始推動？這一系列問題，可能只有在宋明之間徽州地方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脈絡中，才能做出客觀而確實的解答，也唯有如此，才能進而瞭解近世中國歷史中文化與社會密切互動的多元面相。

- 1 參見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3-19；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4），頁155-332。更詳盡的有關理學與「經世」問題的文獻回顧參見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第19卷，第4期（2008），頁121-151。
- 2 參見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文史》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35-136；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5。
- 3 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3），頁184-200、238-251。

- 4 參見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41–283；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59–310。
- 5 參見 Paul J. Smith, "Introduction: 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1–34.
- 6 參見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w,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0.
- 7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2–11。
- 8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356–386。
- 9 關於「士紳」概念問題的文獻回顧，參見徐茂明：〈明清以來鄉紳、紳士與士紳諸概念辨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3），頁 98–101。
- 10 費孝通：〈論紳士〉，載吳晗、費孝通：《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頁 1–9。
- 11 黃宗智著，程洪等譯：《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29–330。
- 12 張仲禮著，李榮昌等譯：《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25、91–93。
- 13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頁 371–374；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1.
- 14 左雲鵬：〈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歷史研究》，第 5、6 合期（1964），頁 97–116。
- 15 徐揚傑：《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10–12。
- 16 Patricia B. Ebrey,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7–29.
- 17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38–40；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pp. 127–131;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pp. 158–159.
- 18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272–273；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3–122.
 - 19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Vol. 15, No.1 (1989), pp. 4–36.
 - 20 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2004），頁1–13。
 - 21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8, 23–24.
 - 22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第3期（2000），頁3–14。
 - 23 上列數字為筆者根據《宋元方志叢刊》統計，其中的地名和行政區劃以清代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準。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
 - 24 此處所稱「舊家譜」指編纂刊印於1949年之前者。四種目錄為：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東洋文庫，1960）；Ted A. Telford, Melvin P. Thatcher and Basil P. N. Yang, comp., *Chinese Genealogies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1983)；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合編：《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相關統計分析參見拙文〈明代家譜的著錄及其社會史意義〉，《九州學林》，第4卷，第4期（2006），頁224–248。
 - 25 《千頃堂書目》所著錄宋明時期徽州士人文集數由筆者統計而得，這些文集今存數量的得出，則經過了與近年出版的兩種重要古籍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四庫系列叢書目錄》的比勘，斷代的標準也參照了兩者。參見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四庫系列叢書目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6 《新安文獻志》所收錄徽州本籍作者人數為筆者根據該書〈先賢事略〉統計而

- 得。另據該書的具體編纂人之一王宗植自稱，「《新安文獻志》分甲乙兩集，共一百卷，文凡一千八十七篇，詩凡一千三十四篇」。但根據筆者的實際統計，《新安文獻志》所收「文」只有956篇，兩者略有出入。參見《新安文獻志》（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先賢事略上〉，頁1上-58上；王宗植〈《新安文獻志》後跋〉，頁1上。
- 27 金德珣編、蘇大校訂：《新安文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天順四年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關於《新安文粹》的作者和成書情況，《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均有記載，前兩書均有誤，《四庫全書總目》比較準確。參見《千頃堂書目》，卷31，頁15；張廷玉：《明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9〈藝文志〉，頁2496；永瑤總裁，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91，頁1741。
 - 28 關於徽州在二十世紀的行政區劃沿革情況，詳見安徽年鑒編輯委員會編：《安徽年鑒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頁261-262。
 - 29 相關的研究文獻回顧參見陳柯雲：〈徽州文書契約研究概觀〉，《中國史研究動態》，第5期（1987），頁1-7；曹天生，〈本世紀以來國內徽學研究概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1期（1995），頁110-115；鄒怡：《明清以來徽州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論文，2006），頁3-24，237-277。亦可參見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編：〈徽學研究論文索引與檢索〉，<http://www.huixue.org/hxlwjs.htm>。
 - 30 參見Shiba Yoshinobu,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trans. by Mark Elvin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0), pp. 92-95; 黃寬重：〈程秘與《洛水集》研究〉，載氏著《南宋史研究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89-183；葛紹歐：〈宋代徽州的文教〉，載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1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小松惠子：〈宋代以降の徽州地域発達と宗族社會〉，《史學研究》，第201期（1993），頁19-42；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頁27-100。
 - 31 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131-269。
 - 32 唐力行：〈論徽商與封建宗族勢力〉，《歷史研究》，第2期（1996），頁150。
 - 33 Ping-ti Ho,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7, No.1-2

- (1954), pp. 130–168.
- 34 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頁106–144。
 - 35 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載《徽商研究論文集》，頁37–38。
 - 36 H. T. 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1800* (Leiden: Brill, 1989), pp. 67–104.
 - 37 朴元燾：〈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第1期（1997），頁33–45。
 - 38 中島樂章：《明代鄉村の紛争と秩序：徽州文書を史料と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2），頁203–205。
 - 39 Keith Hazelton, “Patri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Lineages: The Wu of Hsiu-ning City, Hui-chou, to 1528,”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37–169.
 - 40 Qitao Guo, *Ritual Opera and Mercantile Lineage: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Huizhou*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 41 鄭力民：〈徽州社屋的諸側面——以歙南孝女會田野個案為例〉，載趙華富編《首屆國際徽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34–53；常建華：〈宋元時期徽州祠廟祭祖的形式及其變化〉，載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徽學》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頁38–51。
 - 42 陳柯雲：〈明清徽州宗族對鄉村統治的加強〉，《中國史研究》，第3期（1995），頁47–55。
 - 43 Joseph McDermott, “Land, Labor, and Lineage in South-Ea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Shanhe Cheng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The Song-Ming Transition: Making Connections”,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CLA, on February 13, 1993. See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24–25; 朴元燾：〈明清時代徽州商人與宗族組織——以歙縣柳山方氏為中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1999），頁296–291；白井佐知子：〈明清時代之宗族與宗教〉，《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04），頁97–103。
 - 44 周曉光：〈新安理學與徽州宗族社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01），頁26–31。

- 45 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禮儀與社會生活〉，載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168-216。
- 46 有關明清徽州宗族的研究狀況，參見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學》，第2期（2003），頁67-72；常建華：〈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綜述〉，《安徽史學》，第1期（2010），頁95-100。